

“新经济”解读

——美国的奇迹和美国的知识经济范式

周茂荣 贺春临 吴姚东

对未来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而言,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无疑将是具有转折意义的辉煌一页。在这短短的历史瞬间,冷战格局突发性的彻底瓦解使世界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开始浮现出来,并迅速臣服于一个新的、动态的、全速变动的全球经济竞争日程。人类社会一系列重大的、标志性的经济事件,如亚洲金融危机、欧元的诞生和美国的“新经济”等等,在这 10 年如此集中地涌现,不仅演绎着世界各国经济力量极富戏剧性的潮涨潮落,而且展示着过去不断成长但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抑制的力量——如经济全球化态势、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正在爆炸性地释放出来,并聚合成滚滚向前的浪潮,以完全不同于工业化时期的方式和速度磨洗出一场格局、体制、产业结构、贸易和投资布局、技术和思想特征等方面意味深长的变化。新世纪的世界经济图景就在这些深刻变化中向我们大致凸显了它的轮廓。

美国的“新经济”无疑是我们这个转折时期最为亮丽的风景。不仅仅因为美国是一个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超级大国,它占世界经济总量四分之一的经济规模和占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 50% 左右的股市市值对全球经济运行具有主导作用;也不仅仅因为“新经济”正在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性质和前景正引发规模空前、经久不衰的关注和辩论。更重要的是,愈益明显的美国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模式表明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潮流的始作俑者,而且表明美国以其灵活有效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了这些潮流使自己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奇迹般的良好态势。同时它也表明,新的变革虽然尚未完成,但是正以人们难以预计的速度和难以估量的深度推进着。对学者而言,亟须从“新经济”中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动态、经济学理论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得出更完整、清晰的概括;对各国政府而言,亟须从美国的经验中认识到差距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推进和引导国家紧紧跟上并正确顺应新的历史变革;对个人而言,亟须对社会的迅速变化反应灵敏并充分准备,以塑造未来的成功之路。

—

人们对“新经济”的认识首先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空前持久和伴随这次增长的一些新现象开始的。自 1991 年 4 月走出低谷以来,美国经济已保持了 116 个月的持续增长。在这段时间里,不断有经济学家声称美国经济即将结束增长步入调整,然而美国经济快车滚滚向前的现实一次次将这些预言碾得粉碎。事实上,美国已经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扩张纪录,而且这次扩张扭转了以往的正常秩序,先是初期的缓慢爬升,然后是快速的急起直追。1996 年以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实际增长率平均达到了 4%,2000 年 GDP 的年增长率达到了 3.2%。

一般认为,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高速的经济增长很难持续。而且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有一条著名的菲利普斯曲

线,它断定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不能并存,至少不能长期并存。据此,美国政府包括联邦储备系统长期以来进行宏观调控时把“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简称 NAIRU)当作重要依据,并根据历史上的官方统计数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把 5.5%~6% 的失业率和 2.5% 的经济增长率视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调控目标。

但是这些规律和历史经验对当今的美国没有发挥作用,美国经济创造了神话: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在持续走低。失业率先从 1992 年的 7.4% 和 1994 年的 6% 逐步降低到 2000 年的 4% 左右,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近五年来,在扣除曾减少的就业基础上,美国经济创造了 1600 万个就业机会,而且 2/3 的工资高于中等水平。通货膨胀率自 1992 年以来,一直控制在 3% 以内。1999 年底,如果不计食品和能源,美国消费品通胀率只有 1.9%,增幅为 1964 年以来的最小值,并且没有明显的上升迹象。而且,有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官方统计的消费价格指数高估了通胀率至少一个百分点。若真如此,那就意味着美国经济正在接近一种零通胀经济。

低通胀意味着更低的利率,更多的资本投资,正在上升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快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实际收入,推动着居民消费的持续高涨,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美国经济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表现得如此坚挺,以至曾经从亚洲蔓延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 1999 年 11 月开始至 2000 年年中的石油价格飙升都没能轻易地破坏它。当然,这些因素影响了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1999 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超过了 3000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7%。贸易逆差的巨额增长也许始终是人们的一个隐患,但它的性质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是由世界上最庞大和最强劲的消费需求引起的,而不是因为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造成的。相反,美国的出口增长很快,是整体经济增长的 3 倍,并且服务业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更为迅速,比如高级半导体、计算机网络服务器、个人电脑、软件和服务、娱乐、金融和通讯等,构筑了美国知识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引人注目的是,巨额贸易赤字并没有使美元信誉受损,出口的增长是在美元保持了世界最坚挺货币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

人们对“新经济”的认识还来自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明显不可控制的财政赤字困境出现了根本的扭转。自 1998 年实现杜鲁门政府以来首次财政盈余后,1999 年美国又出现了高达 1227 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这既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获得的巨大“和平红利”的一部分,又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利益的确凿证据,也是克林顿执政以来坚持不懈的“重建财政”政策的巨大成效。财政盈余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它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总量平衡状况,实际上增加了市场的资本供给量,有利于促使长期利率的下降并保持在较低

水平,从而刺激企业投资。更重要的是,它使美国政府终于摆脱了依赖公共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做法,从而有可能避免这种政策的通常恶果。并且,国家有了更大的意愿和能力从事对教育、知识、基础设施这类更具战略意义的投资。

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兆头,以及逐渐积聚起来的消费者的强大信心,终于造就了一个更空前的财富神话:道·琼斯工业平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攀升,屡创历史新高。前者从90年代初的3000点猛涨到1999年初的万点以上的水平,后者从1995年的1000点跃升到1998年的2000点,而后在1999年的短短6个月里,又突起高潮,从3000点飞上5000点,升幅之巨,前所未有。从经济的微观基础来看,前者更多地表明传统企业先是减员重组初现成效,随后又普遍而迅速地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统计,1995-1999年,美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每年递增2.8%,比1973-1995年的年均增长率1.4%翻了一番,也比日本、欧洲高10~20%。对后者而言,以网络和电脑股为代表的高科技概念股票的狂升猛涨,如美国在线的市值在近10年间上升了约800倍,微软股价的升幅超过70倍,一些新兴的网络股如“亚马逊”、“雅虎”等升幅更猛,不仅有力地支撑着纳斯达克急速成长为全球最大股票市场,而且大规模的资本运动表明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同美国经济繁荣的持久相比,美国经济基础的结构活力更加激动人心和令人憧憬:美国人冲进了信息时代。

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占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支出。由于居民部门持有股权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或趋势)效应和即期效应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美国股价指数的持续走强极大地改善了个人、公司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刺激了非凡强劲的个人消费需求——2000年上半年消费开支增长速度已名副其实地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以及公司的投资需求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能力。社会总需求的持续高涨无疑是美国经济创纪录增长的动力。

股市繁荣对经济的直接促进功能还表现在,它与人们对新技术和美好前景的坚定信仰相结合,创造了结构调整的“超速运转”模式:虽然高科技产业和企业(特别是网络公司)可能初期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回报或回报很少,但价值的计算方式不再是以短期的利润前景为基础,而是以人们认为这些产业和企业在经济关系即将发生变化的新世界里扮演的角色为基础。通过社会公众和投资者竞相高价购入高科技股,创新能够得到更迅速和更高额的回报,从而能很快地实现产业化,并支持更多、更大的创新。这种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不仅契合了当代技术突飞猛进和竞争激烈的现实,也更迅速和有效地改变着美国经济的面貌。

总之,在最新发生的美国奇迹里,该上升的都上升了——GDP、资本开支、收入、股票市场、就业人数、出口、消费者信心和企业信心;凡是该下降的都下降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新经济”之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

1994年,美国《商业周刊》第一次提出美国已进入一个生产力快速增长的时代——“新经济”时代。从此,有关“新经济”的字眼开始横扫全球重要媒体,并拉开了20世纪末一场持续浩大的激烈辩论的序幕。这场辩论席卷了全世界,并引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热烈关注和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美国奇迹空前持久的现实,即使那些不愿意看到经

济理论“各项基础”受到动摇的主流经济学家本身也发生了分化。有关“新经济”的重要论点迅速深入人心并正在形成全球共识:美国的“新经济”是具有非凡推动力的信息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以及二者相互促进的成果,是人类生产方式和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巨大变迁的序曲。

美国“新经济”的巨大潜力根植于信息技术产业和企业的罕见高速增长。在过去10年中,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产业在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广泛的技术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最明显的两个现象: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全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飞速上升,从1994年的6.3%上升到2000年度的8.3%——尽管只占经济总产值的一个相对小的份额,但是它们在1995年到1999年期间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达到了30%。最直观的印象是,今天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已明显不再是房屋建筑业和汽车业,以微软、英特尔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巨子正在以令人眩目的财富增长迅速取代传统的石油、钢铁、汽车、金融大王的领导地位。二是信息技术产业能更容易、更迅速地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也能创造更多和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199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加速下降——1994年约下降1%,1995年约下降5%,1996到1998年年均下降8%。信息技术部门的价格下降已使1994年到1998年的美国通货膨胀率全面降低——从2.3%到1.8%,平均下降了0.5个百分点。此外,要全面估算信息技术在降低通胀中的贡献,还要考虑到在除信息技术产业之外的其他92%的产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及其价格下降对增强这些产业之间竞争性和提高它们效率的作用。在提供就业方面,从1994到1998年,信息技术产业的就业人数几乎增长了28%(从1992年的390万增长到1998年的520万),而同期全美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大约增长了11%。尽管1998年信息部门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不到5%,但信息产业的就业倍增效应比传统产业高。例如,微软公司每个就业机会可创造6.7个新工作,而波音公司每个就业机会只创造3.18个新工作。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广泛应用需要吸收更多的熟练劳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产业薪金一直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增长也快于其他产业,强购买力支撑的高消费提高了就业的倍增效应。

作为经济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在1995年以后终于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加速上升,一扫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扩张成熟这一指标显现出来的持续下滑的颓势。这表明战后兴起的以计算机和通信为两大支柱的现代信息技术在经历了一个技术发展的长过程后,终于聚合成革命性的基础技术突破,并开始显著作用于经济。这场突破以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的迅速扩张和商业化为中心,引发了网络的爆炸性成长,并伴以电脑处理能力的疯狂增长和功能强大的新软件的持续增加,同时催生了电子商务这种会带来经济领域深刻变化的新的商业形态。这些技术上的进步不仅刺激了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以及利用和提高该设备生产能力的新软件的巨额投资——1995年到1999年之间,这类投资翻了一番多,成为最近美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且互联网的迅速大众化、普及化、社会化,在创造大量与之相关的新企业的同时,使信息技术更迅速地渗透到或融合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使所有企业都能更方便、更便宜地处理商务和交换信息。越来越多的企业“触网”,表明积极利用网络改善运作方式——协同产品设计、管理库存、改善顾客服务以及降低管理成本,已成为企业为发挥信息技术投资的最优效果进行适应性组织改造的必然趋势。

也许,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推动了一个动态性层叠或持续的创新高潮。首先是软件上的无数创新,而后在企业组织形式和运营方式上产生了无数创新,这又导致了企业和个人可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更多的创新。这种创新的“蜂巢”和围绕信息技术创新的复杂性,不仅使得信息成为经济中创造价值的最重要基础,而且改变了竞争的性质:在标准化产品和批量生产的时代,规模和速度是最重要的,但如今企业的竞争原则是不断推出新的、不同的和升级的产品以及管理办法。结果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对诸如创造力和想像力等人与计算机相适应的技能的竞争的竞争空前激烈。当前,美国令人瞩目的两种潮流——大批高技术企业的迅速崛起和企业间大规模的重组并购就是这种创新和竞争空前发展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技术和经济巨变的产物,而且这种巨变又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的性质和方向,并塑造了新的经济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对经济增长规律的不断探索表明:知识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并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战后的美国经济总体上处于一个长的扩张和短的衰退的趋势中,这是更多更大范围的创新加速和更好的经济管理的结果,同时,仍然存在的衰退也表明,经济必然受到代表陈旧技术的主导产业的资本积累已出现过度倾向的影响。信息技术在经历了充满无数传奇色彩的发明、创造、机遇和曲折的漫长历程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质的飞跃。互联网发展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对信息产业本身,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发展的作用,它实际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效率,而这种效率恰恰是决定今天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如同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一样,互联网扩大了人的脑力并延伸了人类语言;如同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加快了工业时代的物流一样,互联网作为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和制度基础,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类方便、低廉地获得大量信息的需求,并使所有产业都建立在互联网上,极大地促进了财富的创造;如同土地、资本、劳动是工业时代的生产要素一样,互联网驱动的“新经济”中,知识和技术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开始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知识生产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产业。知识和信息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人们对发展高科技的关注点,正由关注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转向关注对技术进步的源泉——教育、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同工业经济的旧世界要忍受较强的周期性波动和大规模的环境破坏的困绕相比,互联网相关技术的独有特性:迅速的渗透能力、收益递增的规律、正向反馈的“网络效应”以及节约资源、不污染环境的特点,给人类带来了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希望,从而有可能形成迥异于以往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美国的“新经济”也不仅仅是信息技术革命独立支撑的成果,它还得益于同样是这场革命促进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更加广阔的市场环境和更加迅速的全球性资源再分配。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国际竞争的广度和深度空前地扩展。一方面,面向全球的管理创新和跨国化经营方向正愈益成为企业提高效率和改善利润的普遍手段,大公司正在掀起合并成更大公司,向全球化发展的浪潮。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抑制了企业提价的空间,并侵蚀了传统上强大的工会力量。

经济全球化是美国“新经济”产生的原因,也是其发展的成果。当美国的高技术工业是技术进步自身规律推动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时,事实上它的成长也一直受到另一挑战——国际竞争的推动。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在美国20世纪

70、80年代对欧、日经济优势和贸易优势不断削弱的过程中,真正得益的却是美国。因为正是日本高效率的竞争,迫使美国放弃了对它来说曾经具有较大优势的传统产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发展领域内,建立了新的优势,并把相对来讲知识含量偏低的大量产业“让”给了发展中国家。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更明显加快了这一结构调整的步伐并降低了这种调整的成本,而这种以高科技内容为中心的结构重整正是美国经济90年代以来蓬勃增长的坚实基础,使美国抢占了世界知识上游产业的有利地位,当然也加深了其自身对世界分工体系的依赖,使得美国经济增长愈益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更大作用。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出口国,进出口额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11%上升到了1997年的25%。而且,美国越来越专注于提供复杂的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表现在美国每一美元的出口的重量自1970年以来已下降一半以上。美国经济增长的1/3依靠出口驱动,1/5的就业机会依赖出口解决,而出口部门的工资比平均工资约高出13%到16%。与此同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也是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者。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比德国高32%,比日本高出1倍以上,而且美国有60%以上的企业经营是面向全球化的,这一比例比70、80年代要高得多,并从中产生了世界上数量最多、实力最强的跨国公司。

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独特的国际收支结构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全球廉价、低附加值商品的大量竞争性涌入,有效地抑制了美国通胀并刺激了消费和投资,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更加显著。这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建立在更少消耗本国资源而更多依赖别国资源基础的模式有了更大的规模和条件。另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资本净流入最多的国家,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的持续强劲,这一趋势也在显著增强。巨大的资本净流入不仅弥补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和低储蓄造成的资金缺口,而且有力地支撑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巨大得益和其重新夺回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成为90年代以来美国积极主动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动力,并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浪潮的主导力量。

正如19世纪后半期运输费用的下降推动了国际性资本和商品往来的迅猛发展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呈指数增长的信息技术进步和扩散推动的。而全球范围的市场化潮流、贸易的自由化和金融的放松管制以及跨国公司的空前扩张,也是推动信息革命的巨大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加强,使得这次经济革命呈现出与以往重要的经济革命显著不同的积极变化。美国的“新经济”表明:投资持续增加可能导致一国经济连续增长,而且,经济史表明,重大的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应用及其效果的显现,需要一个较长的历程。当前,对互联网高效能的利用即使在美国也才刚刚起步,新产业的成熟还有一段路要走。电子商务的总额目前还只占美国GDP的一个很小的比例,但在未来四年,它预期将每年增长85%,达到2万亿美元,从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也有类似的过程。这一方面表明美国仍处在向“新经济”转变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个初级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成就预示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变革时期,通过互联网跨越了空间的信息革命正带来意义超过19世纪产业革命的历史性巨大变革。

在“新经济”概念出现之前的一段时期,经合组织

(OECD)出版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知识经济”一词不胫而走,迅速深入人心。紧接着,全球又很快掀起一股追捧“新经济”的浪潮。在短短几年之间,两股热潮的先后涌动似乎存在某种联系。如果我们把知识经济理解为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独立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经济”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所独具的经济增长动力、要素和方式,经济运行的基础和规则。与其说我们对美国的“新经济”模式充满了“长期繁荣”的憧憬,不如说我们更希望从美国的“新经济”实践中,对未来知识社会的经济状况、政策和经济学理论有更完整、清醒的认识。美国的“新经济”正在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经济和社会结构提供活生生的例证。

这两股热潮接踵而至的现象还说明,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变出人意料地快速而迅猛。与之相比,工业革命的发展是演进式的。当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人们虽然都不可避免地自觉地卷入这一伟大的革命进程,但直到100年后的1884年才由阿诺尔德·汤因比第一次提出“工业革命”这个名词和其理论概括,并流传至今。而现在人类前进的步伐远远快于从前,经济发展从较低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转化的加速使人们很快意识到需要接受根本性的范式转变,信息和知识将成为起决定作用的资源。

经济发展的新范式终将很快取代工业技术的范式,从而使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迈进知识经济时代。

毫无疑问,美国在“新经济”这场历史性的巨大转型中又一次走在前面,具有科技、经济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优势,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从本质上讲,从全人类的角度而言,这不是来自美国的挑战,而是来自历史的挑战。

三

美国的“新经济”犹如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曙光,照亮了人类新世纪的前景。从欧洲到亚洲,对新经济的乐观情绪正在掀起全球范围内追捧“新经济”的热潮,整个世界都憧憬能走向由非凡的技术进步和全球竞争推动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经济”。

但“新经济”的发展不会一蹴而就,不可能期盼它会在一夜之间就惠及全人类。“仅靠手机和因特网帐户本身并不能使全球经济发展更为活跃,还需要对核心机构和部门实施巨大的改革,将技术转化为快速增长的生产力。”随着“新经济”的探讨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长期酝酿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曾面临过几乎同等的机遇和挑战,但唯独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中产生了更早、更自觉的某些制度变革和创新,这些变革和创新较好地适应了历史进程的变化并使之服从服务于美国利益。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才使美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此,在“新经济”的内涵中,“制度”逐渐获得了与“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

对现在的大多数研究者而言,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所患的严重的“滞胀病”转变为90年代的“新经济”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80年代就开始的体制和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产物。这场大规模的调整起源于70年代后两次石油危机给美国以钢铁、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实物经济的冲击和人们对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后果的反思,也受到喧嚣一时的美国“将无可挽回的日趋衰落”的预言的刺激。就宏观政策而言,尽管里根-布什时期的政策侧重和克林顿时期有所不同,80、90年代的繁荣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但两个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和调控方式,包括政府主流经济学的

发展变迁基本上是一脉相连的。从里根时期减税、降低管制到克林顿时期修改电信法,政府宏观政策的重要任务都是推动竞争,从而培育了美国更为发达、灵活有效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其对新固有的激励作用。货币政策上,持续的反通胀目标也都是共同的“经济信条”。90年代的格林斯潘在利率杠杆上的长袖善舞,游刃有余更是有目共睹,使张弛有度的利率微调成为美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有力保证。

美国政府的另一项重要政策目标是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竞争力中的优势地位,其中主要的手段是追求美国在技术突破和技术综合能力的领先地位。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是美苏争霸下的“冷战”产物,但事实上后来成为美国信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到了克林顿执政时期,更是重视发展高新技术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政府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削减国防支出、加大科技投入,加大基础研究预算拨款比重,制定产业技术力量政策,完善对高技术发展的组织领导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研究和开发等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克林顿在2000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将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一,财政约束,有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商业投资;其二,投资于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科学和技术,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其三,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打开国外市场,以便美国人能有更好的机会参与海外竞争。1999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将这三大支柱称为美国政府的“新的经济战略”。美国“新经济”的实践表明,尽管许多经济学家把“新经济”归之于自由市场经济复兴的结果,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新经济”同样是美国有效的政府管理的产物。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重要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减少了,而政府的职能更集中于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创造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同时政府也是创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的主体。

从微观上看,美国的企业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组织结构、企业战略思想和决策体制、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及方法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其核心是保持企业的创造力,推进开发新技术的速度及提高投资的规模和效益。在过去10年中,美国企业一方面在重整流程、减员、合并、重组上花了很大力气,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企业的内部研究和开发,许多旧经济企业巨头通过引入信息技术和开辟新型网上事业已经成功地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更多的公司向全球化发展和研究和开发支出在企业投入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是新阶段的普遍趋势。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纳斯达克在90年代的迅速扩容,并取代老牌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是美国进入“新经济”阶段的重要标志。以美国现代高科技产业为主体的纳斯达克的迅速崛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美国技术创新的制度建设正是美国“新经济”的最重要特征,也是美国技术创新一浪高过一浪、长盛不衰的重要保证。从80年代开始,以投融资方式创新为特征的风险投资制度、以纳斯达克为特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以知识产权为重要特征的产权制度、以科技园区和孵化器为特征的产学研结合机制、以股份期权制为代表的创新激励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等等在90年代逐步完善,同美国的一贯重视创新的传统、强大的高等院校科研实力和长期的科技成果的积累以及开放的移民政策建立起来的高技术人才库等相结合,使得技术创新周期大大缩短,数目众多的中小企业迅速诞生和崛起,能很快地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市场结构、经济结构,整个美国经济的活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大为增强。

总之,美国的“新经济”不是单一力量的结果,而是众多因素的合力。正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4月5日召开的“白宫新经济会议”上所说的:“是技术推动新经济向前发展,新经济的推动力量根植于新的技术、思想和强烈的创新精神、进取心。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说明新经济的发展业绩。我想,很清楚,新经济的本质和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发挥了领导作用。传统产业及其员工提高生产力也发挥了作用。我也相信,政府关于严格财政制度、扩大贸易、加大对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投资,特别是在构建新经济繁荣的基础方面作出的努力也起了重大的作用。”美国的这些经验正在成为世界走向新旧经济形态交替的过渡时期的宝贵财富,并化为巨大的政策号召。今天,对技术的投资持续高涨,放松管制的步伐加快,金融市场重建以支持创新以及人们更加乐意冒险,显示出这些趋势已处处可见。

但是,“新经济”的全球扩展不可能意味着统一的美国模式的扩张。即使在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比如庞大而十分流动的资本市场、风险资本的网络、世界一流的大学、高技术人才库以及美国60年代以来逐渐由多样化、追求个人价值和创造性的生活方式、管理学的变革、高教改革等构成的有利于创新精神成长的社会条件,这些因素并非都在别的国家起作用,而且所起作用的程度与在美国也不一样。并且,美国的“新经济”也有其“独享”的条件和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形成的以美元霸权为代表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特权地位,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综合调动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来保持对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强大控制力。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吸纳地,它控制了世界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各国最大的外部市场,它也控制着商品价值实现的流动方向,二者既为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和迅速的结构转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要素和资源,也为美国率先实现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并进而长期控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创造了最根本的优势。而美国的“新经济”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世界经济中这种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并使得世界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依赖美国:当世界需要从美国的繁荣中分享巨大的利益和进步的成果时,美国正向全球“输出”它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试图左右他国的社会经济进程方向;它控制着技术创新的扩散方式和流向,还试图保持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从而制约了技术创新潜在的社会、经济效益充分地发挥。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先行者的同时,又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其他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但归根结底,这是历史转变过程中的挑战。事实表明,越是阻碍及推迟这一转变的时间,“新经济”的调整就越会过激和令人痛苦。在90年代世界经济实力的对比重新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过程中,欧盟久拖不决的高失业率和东亚金融危机已在从反面证明以自然资源和对旧式工厂和设备的资本投资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的重要性正在削弱。当今国家力量的对比已越来越取决于对人和知识的投资。虽然这并不否认自然资源仍然存在的重要性和更加合理地保存这些无法再生的资源的必要性,同时也不否认资本的作用和对通货膨胀加强控制的必要性。但是,一旦人们充分认识到“新经济”能强国这一重大历史规律的时候,知识就应被看作是一种战略资源,其重要性相当于甚至超过自然资源和有形投资,那么,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随着国家重点的不同和战略安排的不同而改变。而在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科技和教育,它们是应对新的变革和发展“新经济”的两大支柱,从长远的战

略需要出发,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系重新给予支持并重新制定方向,并根据自己的特点找到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正在成为各国的共识和新的行动模式的核心。

对中国这样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二元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面临的问题更为广泛而深刻。当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使得资本和知识的全球传递更为方便并燃起各国通过后发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的热切希望时,新的“数字鸿沟”和全球化带来的“放大效应”有可能正在拉大同“中心国家”的差距。当它们正为信息化培育其工业化基础的时候,大量的高智力人才存量的无形损失不仅使各国失去了长期支付的凝结在这些人才身上的人力资本,也正在进一步降低它们的人力优势,并削弱其发起向数字化冲锋的能力。美国的经验说明,创新是“新经济”的核心,只有那些最富于创新精神的社会环境才能长久地占有优势。中国当前面临着艰巨的“双重”任务,在大力发展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加速技术创新的市场体制和社会条件,这是切实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就目前来讲,研究和借鉴美国“新经济”的经验,在制定和实施适宜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建立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优化经济结构并使主导产业部门能够反映出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潮流,塑造现代企业使微观经济具有活力、培育自主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机制以及在应对全球化、信息化等方面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都是我们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国家的力量将是我们渡过艰难转折时期的至为重要的因素。

如同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转变时一样,人类在迈入知识经济的过渡中也不大可能是一帆风顺地发展。“新”“旧”经济之间必然会有矛盾和冲突,当这些矛盾在世界其他地区已显现出程度不同的危机和动荡时,新经济的发源地——美国,同样不能幸免。事实上,美国经济上空的乌云:经济过热,正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高额债务和金融泡沫对引发股市崩溃和经济转入萧条的威胁也一直在不断聚集,并显露出“新经济有可能出错”的迹象。2000年4月份以来,美国股市开始进入调整期,代表“新经济”的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从2000年3月的最高5048点一路下滑到最低的1620点,下调68%。而GDP增长率也从2000年第二季度的5.7%降到2001年第二季度的0.3%。这不仅再一次证明了虚拟经济不能超越实体经济而发展,而且使人们开始担心美国经济是否已处于周期扩张的强弩之末阶段。

究其原因,美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由政策性和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前者的主要表现为:美联储从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的6次加息,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了对利率敏感的金融市场和耐用消费品等部门的生产;其次,1999年3月世界原油价格从最低点10美元/桶左右开始了持续1年多的上涨,直到2000年底OPEC综合油价仍在28美元/桶以上。由此企业和个人多支付了相当于GDP 1.5%的费用;同时,如同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那样:“财富效应”可能是非对称性的,即美国股市下挫打压消费支出的效应将高于股价上升促进消费支出的效应,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消费萎缩。最后不能忽视的是近几年企业对信息技术产业的过度投资造成这些部门的生产过剩,存货积压。据统计,2000年第4季度和2001年第1季度的存货调整使得美国的GDP分别减少0.5和3个百分点。而后的表现主要在美国难以克服的经常项目逆差、私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家庭债务激增和储蓄率下降。这些结构性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得到完全调整的。

在这种背景下所发生的“9.11”恐怖主义袭击对美国经

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地相继遭到恐怖主义者的袭击,世贸大楼受两架被劫持飞机的攻击完全倒塌。“9.11”事件无疑为美国经济走势增添了新的消极因素。

首先,据纽约审计官员估计,这次恐怖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达到900亿美元。

其次,恐怖事件导致股市再次暴跌。美国股市因“9·11”事件而关闭4个交易日后,尽管美联储在复市前第八次降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稳定股市也放宽了上市企业回购股票的限制,社会各界也是呼吁民众购买“爱国股”,但9月17日一复盘,恐慌性抛售仍然导致5个交易日连续“收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指、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分别下降14.3%、16.1%和11.6%。三大股指统统跌到了近三年来的最低。估计股市缩水6.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日、德、法三个经济强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再次,恐怖事件直接冲击了航空、保险、旅游业,间接波及飞机制造、零售、汽车、娱乐等行业。仅保险业损失估计就高达300亿美元,各大航空公司一周内就宣布裁员10万人。

第四,恐怖袭击事件严重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尤其是10月8日凌晨,美英联合部队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更增加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加重了投资者的“恐惧心理”。

第五,在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加强了边境检查措施,这等于向企业征收“安全附加税”。从而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使得经营成本增加,生产率下降。

美国在遇袭事件后立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措施。

在财政政策方面,美国政府批准了40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计划和150亿美元的航空业援助计划,扩大原定的26周失业援助等计划,要求国会在原先减税的基础上,再次减免最少600亿美元的税收等。格林斯潘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也建议迅速启动一个1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在9月17日、10月2日、11月8日和12月12日连续四次降息,目前,联邦基金利率为1.75%,是39年来的最低点;贴现率为1.25%,是43年来的最低点。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欧盟、英国、日本和瑞士等中央银行纷纷降息,以缩小与美元的利差。

自2001年1月以来,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已经连续采取了七次降息行动来挽救持续走低的美国经济。因为货币政策拥护者们的信条是:在低利率政策下,股市的良性反应将胜过财政紧缩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短期信贷的成本大幅度地降低,美国经济的增长仍然在放缓,人们的目光因此又转回到了财政政策上。目前,布什政府明显地支持施行低税收及高公共支出的政策。2001年上半年美国就批准了为期10年的1.35万亿美元的减税方案。2002年的政府支出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达到1300亿美元。这种将政府财政赢余转向财政赤字以平衡总体需求短期不足的观点,恰恰是凯恩斯理论中最基本和最精髓的东西。这似乎说明美国政府的经济调节政策的重点有重返凯恩斯主义的趋势。那么这种政策偏好的转变能否挽救美国经济的颓势呢?

展望2002年,可以预测美国经济可能在第一季度处于停滞状态,第二季度开始复苏,全年保持低速增长。之所以做如此推测,不仅在于9.11事件对美国经济而言是一场突发的灾难,不具有持久性的影响;而且在于目前美国经济仍然存在一些有利因素:其一是美国国内通胀率仍然相对较低,

美联储还有一定的降息空间;其二是政府开支的增长将成为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拉动因素。除原定明年减税760亿美元和拨款550亿美元用于救灾和补贴航空业外,布什政府还向国会提交600亿至75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减少资本收益税、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加速设备折旧及增加开支等新举措;其三是信息技术生产的过剩将有所缓和。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计划今后每年拨款1000亿美元购买信息技术设备,以强化政府安全功能。这一举措显然增加了对IT设备的要求;其四是美国与欧洲和日本加强了宏观政策的协调,在利率、汇率、资金流向等方面互相配合,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预言经济走势原本就不是经济科学的“强项”——因为瞬息万变的经济事实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可能不以任何经济学理论为指南。更何况经济周期波动的微波化趋势本身是“新经济”的重要得益之一。但我们理由相信,在荡涤掉“革命中的泡沫”之后,“新经济”的基础力量将更为健康,以高技术企业和传统企业为代表的“新”、“旧”经济的融合也将更为顺利。对世界而言,目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世界资源的重新配置会为“新经济”的全球渗透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也许在短期内,股市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负“财富效应”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这是前进中的曲折,经过这段调整之后,“新经济”的发展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将会迈上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9,2000) .
2. Mortimer B. Zuckerman, 1998 .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 , Foreign Affairs , May /June .
3. Michael J. Mandel ,2000 .The New Economy: It Works in America, Will It Go Global? Business Week , Jan . 31,2000 .
4. Jeffery E. Garten ,1999 .What Could Go Wrong in The New Economy? Business Week , Dec . 13 .
5. Special Report , The 21st Century Economy , Business Week , Aug . 31,1998 .
6. Stephen B. Shepard ,1997 .The New Economy: What it Really Means ? Business Week , Nov . 17 .
7. J. Mandel , Michael , The Real Truth about The Economy , Business Week , Nov . 7 .
8. Krugman ,2000 .America's New Economy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No. Winter ,2000 .
9. Jeff Madrick ,1999 .Just How New is the "New Economy"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Sept . 23 .
10. Washington , DC , and Indianapolis ,1999 . The New Economy , The Economist , July ,24 .
11. 黄奇等译:《数字经济2000》,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0。
12. 刘吉、金吾伦等:《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3. 陈宝森:《论美国‘新经济’》,载《世界经济》,1998(6)。
14. 周茂荣:《美国经济增长特点与成因》,载《人民日报》,1998-02-23。
15. 侯若石:《新经济不是虚幻》,载《环球时报》,2000-12-08。
16. 周茂荣、吴姚东:《师生对话‘新经济’》,载《长江日报》,2000-11-13。
17. 房宁:《美国经济的政治透视》,载《战略与管理》,2000(4)。
18. 刘树成、李实:《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与研究》,载《经济研究》,2000(8)。
19. 甘煜译:《美国新经济峰会纪要》,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391)、(39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Q)